

※ 柯慶明教授紀念專輯 ※

文學為何？文學何為？ ——向柯慶明教授致敬

王德威*

柯慶明教授是臺灣中國文學界的傳奇。自一九六四年以第一志願考入臺大中文系以來，柯慶明堅守崗位超過半個世紀。這期間他見證臺灣中文學界的世代更迭，也參與研究、教學典範的轉換。他何其有幸，曾經師從當年渡海來臺的名家，如屈萬里、臺靜農、廖蔚卿等，成為古典文學香火的傳承者。他又何其有緣，得以和現代文學新銳如白先勇、葉維廉相往還，因此共同奠定臺灣現代主義的基礎。臺灣中文學界「抒情傳統」的建立和發揮，柯慶明是關鍵人物；而九十年代以來臺灣文學研究興起，他是最熱情的倡導者。當代臺灣中國文學界論腹笥之寬闊、關懷之深遠、人脈之豐沛、問學教學之認真，柯慶明教授堪稱首屈一指。

我與柯慶明教授在一九八〇年代中結識。一九八二年秋，我在美國完成博士學位，剛開始在臺大外文系任教。一次應邀在文學院演講，引起慶明兄的興趣前來會場，但他並未表明身分，之後見面才逐漸熟悉。他的大名早在文學院流傳，而他在古典和現代、中文與外文不同學門之間遊走，是當時大家引以為奇的人物。一九八六年我赴哈佛東亞系任教，某次聚會，他才不經意地透露哈佛在考慮我的聘職時，曾經請教當時正好在哈佛訪問的他。經他推薦，哈佛做了最後決定。自此我們成了同行，而且因為教學研究的關係，互動益發密切。

九十年代我只要回到臺北，必定與慶明兄一敘，往往暢談三四個小時以上，有時張淑香教授也加入。日後我對抒情傳統的興趣，還有《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》的寫作，無不有他的提點甚至思路融貫在內。記得他知道我開始對臺靜農先生的書法與詩歌發生興趣，有次我回臺時，特別準備了臺先生的書法專輯相贈。日後只要看

* 王德威，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、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
到並認為我應該研究的書籍資料，必定代為購買或影印；有了新的想法，也必定傾心以告——而且往往滔滔不絕，一發不可收拾。他對前輩學者的敬重，對學生輩的提攜，早已經是學界佳話，而自己的生活細節卻總大而化之。

二〇一四年某夜，在美東突然接到慶明兄電話，希望我回臺大客座。之前我雖多次做過承諾，但從未履行。這次他特別認真，也讓我受寵若驚。於是約定次年春天回臺大任教。二〇一五年重回臺大講臺，感觸良多，離開二十九年，一切人和事似乎都改變了，唯一不變的是柯慶明。他裏裏外外打點安排，熱情周到，而且談笑風生，仿佛處理自己的事情一般。這是難忘的一個學期，而在學期將盡的時候，聽說他身體違和，而且開始不良於行。消息傳來，人人關心溢於言表，因為對大家而言，他是「永遠」的柯老師！

也就在六月，我終於和他電話聯絡上。記得他語氣平靜，但顯然對所發生的或未來可能會發生的有所準備。他希望我代為整理多年尚未結集或已經絕版的文字，總為一書出版。這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事，但斯情斯景，我們都有些心照不宣的意思。那個夏天我仔細閱讀他幾十年來的文字，編為一書，建議就直截了當以《柯慶明論文學》為書名。數十年來，慶明兄著述不輟，早有多部專書問世，從《境界的再生》到《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》，再到《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》，無不顯示他治學的多重興趣。他興趣多元，從來不願刻意自成一家之言。但仔細閱讀他的文章和書籍，我才逐漸發現他的思維一經整理，不但體例儼然，而且突顯他多年治學思辨的軌跡，很可以作為後學者效法或對話的範本脈絡。

《柯慶明論文學》一仍他博雅沖和的精神，探討古典與現代文學的種種面貌。全書共分為三輯，分別題名為理論篇、評論篇、讀書篇，共二十九篇論文。此書至少有三項特色值得我們注意：第一，文章選自柯教授不同時期對文學的思考，從本體論般的大哉問，如「什麼是文學？」、「什麼是文學批評？」，到針對特定文類、作者的應用批評，不僅顯示作者的博學和多聞，也點出時間流變中不變的堅持。第二，這些文章力圖跨越古典與現代、考證與批評、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分界，形成多音複義的實驗。柯教授的嘗試我們今天也許習以為常，但在當年中文系和文學院相對保守的語境裏，卻是極富創意的挑戰。第三，誠如柯所強調，文學創作與賞析是人文活動的極致，不論是對作品指涉的人物情境，或是對評論文字所致意的對話對象，都是「此中有人」。他念茲在茲的是，文學所煥發的倫理意向和呈現。近年西方學界結構解構狂潮之後，重新轉向倫理學研究。柯慶明教授的文學論評因此

更有歷久彌新的意義。他的關懷無他，就是叩問：文學為何？文學何為？

此書最令人矚目的應是第一輯〈理論篇〉。這一輯中慶明兄追本溯源，對文學的本體做出定義。前五篇所觸及的五項問題：談文學、文學史、文學作品與精讀、文學傳播與接受、文學批評。〈談文學〉開宗明義，強調文學史以文字為媒介的審美活動。但不同於其他藝術形式，文字本身已是承載意義的符號體系，發為文章，形成綿密複雜、虛實互動的表義體系。這一體系一方面指向特定時空生命經驗，一方面引導我們跨越時空，形成對「生命的沉思」，「生命意義的高度自覺」。此與西方柏拉圖所建構的模擬／真實的二分範式極有不同。究其極，文學的美感意識必須在倫理關係的開闢中完成。傳統謂「體物」與「緣情」為文學之兩端，柯慶明則在其中看到兩者相與為用的關係，以生命意識的證成為依歸。

循此，慶明兄對文學史的看法亦別有所見。一般以文學史不外累積、敘述文學流變現象，以經典、大師、時代做出進化、遞降、循環的史觀。但文學史畢竟不只是歷史。如果上述文學的定義有其道理，由文學所敷衍、形成的歷史就不能忽略文字表象、會意的中介意義。正因為文字「體物」、「緣情」所構成的網絡如此綿密，文學不能為歷史主義的一時一地所限，而必須「原始以表末」、「通古今之變」。同樣地，文學史的時間也就不能以簡單的進化、退化或循環的公式理解，而必須是「文心」在文本內外顯與隱、正與變的綿延過程。在這層意義上，他心目中的文學史其實是反（西方定義下的）歷史時間表的，但也是最具有「原史」意識的。

這裏的關鍵當然是慶明兄對文學的「文」的理解。眾所周知，「文」的觀念其來有自，意味圖像符號、典章學問、想像修辭、文化氣質，乃至文明呈現。我們今天所接受的以審美為基礎的文學學科，其實遲至一九〇四年才出現在中國學制裏。柯慶明長期浸潤古典文學教養，同時對現代文學深有興趣，因此折衝在廣義與狹義兩種不同文學定義間，特別能顯示他兼容並蓄的努力。現代文學理論多以西學是尚，柯慶明在理解西學前提下，特別強調古典的現代性。他以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到《文心雕龍》等例證，質疑「模擬論」或「表現論」作為理解詮釋中國文學的唯一範式。他力求回到中國文史語境找尋資源，用以作為與西方對話的基礎。

於是在〈論文學作品的精讀〉一文中，慶明兄從「新批評」細讀文本出發，卻強調文字形式「是一個藝術經驗，而不只是經驗的構造」；「文學，就一個完整的經驗論，它的歷程應該是連續不斷」。而所謂經驗不僅是具體實證的，也是心有靈

犀的；不僅是文本互涉的，也是知人論世的。在〈談文學傳播與接受〉裏，他更進一步發揮此一想法。這篇論文從翻譯談到傳播，指出西方二十世紀「語言學的轉向」其實局限語言為形式主義的元素，未必能呼應文學流通的多層意義。慶明兄提出物、象、意、境四重方式，用以和西方理論對話；他指出言、意、象的指涉關係「並不對等或直接反映或反射，所以只有透過『尋』、『觀』的蒐尋跳躍（因而也就是超越）才能進入」。或有同行以為，這仍不脫古典印象批評的風格，但當柯以此與結構主義的傳播理論互相對比，我們猛然理解他的用意不再是恢復國粹，恰恰是在「尋」、「觀」的過程中，他將中學與西學的論辯提升到另一層次。以此，他印證〈略論文學批評的本質〉中所謂，文學是一種人作為主體存在的知識創造，而文學批評即是這種知識的再創造。

以上這五篇論文涵蓋文學本質、創造、閱讀、傳播各層面，論述細緻，思慮周延，可以看作是柯慶明教授多年文學理論的總結。更具宣言性的論述則是〈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弁言〉，這一叢刊其實脫胎於《現代文學》所發表的文字。慶明兄指出，文學作品固然有所屬時代的歷史性，但更重要的卻是體認它所具有的「永恆的當下性與同時性」：

文學的本質，歸根究底……就是一種藉語言表現所反映的，特殊情境下的生命意識。因此，「文學自身」的研究工作，永遠必須針對作品的語言表現所反映的，特殊情境下的生命意識的興發、感通、覺知。

在中文系以章句訓詁是尚的傳統裏，這一立場的突破性可想而知。而柯立論的源頭，應該是由陳世驥、高友工先生從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引入臺灣學界的「抒情傳統」觀念。

陳世驥、高友工兩位先生的理論背景不同，前者延續三十年代傳到中國的形式主義美學；後者則步武分析哲學、結構主義的信條。但殊途同歸，他們都企圖打破西方文學批評局限，重勘古典文學思想的新意。對他們而言，「抒情」不僅直陳詩歌文類之一種，也延伸為審美風格、文化語境、生命情景的思考與銘刻。陳、高兩位的立論在彼時中文學界帶來一股維新風潮，影響至今不息。相對大陸學界輾轉在革命、啓蒙論述的窠臼裏，臺灣學界從抒情入手，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文學觀。尤其在慶明兄細緻的分析裏，抒情起自個人感興，繼而緣情、體物，詩史互涉，終而與天地宇宙共鳴。抒情的極致，是柯所謂的「同情」：「生命彼此內在深處的相同，所生發的共同存在的感覺與意識」（〈論詩與詩評〉）。這是文學由審美、倫理層面上

升到形上層面的最佳示範了。

上個世紀末後學當道，先是後現代主義解構人文標誌，繼之以後殖民主義打倒帝國權威。後學的貢獻不可小覷，但一旦成為人云亦云的切口或招式，仍失之偏頗淺薄。畢竟文學或文學批評之所以存在，不只是作為解構質疑的遊戲工具，或是苦大仇深的控訴管道；前者的玩忽和後者的義憤，只有在更寬厚的論述裏才能充分發揮其辯證能量。「同情」的詩學之所以值得我們繼續探討，因為同情的「情」不僅是七情六慾，也是生命特殊存在的樣貌（情景交融），更是具有超越面向的道理或意圖（盡得其情）。同情不是簡單的人道主義姿態。柯顯然認為，唯有「情」的多元性及能動性才滋生了引譬連類、綿延不絕的文學——以及生命倫理——實踐，而不必僅是哲學或政治的附庸。當代西方理論正面臨何去何從的困境，慶明兄的「同情的詩學」源自古典而又和當代情境息息相關，大有繼續發揮的餘地。

《柯慶明論文學》在理論辯難之外，有大量的篇章實踐作者의思想和立場。如他對謝赫六法、「氣韻生動」的解讀，對西方悲劇英雄的中國式回應，都是他以抒情詩學為基準，延伸而出的「同情」的詮釋。但是在他對師長文友作品的評點過程中，我們得見他如何將文學批評的倫理和審美雙重能量，發揮得淋漓盡致。他讀朱西甯的《鐵漿》，以細緻的文本細讀始，而以對天地不仁的感懷終，在在顯示他對文學作為思考生命的方法。而他對臺靜農先生的新舊詩歌，白先勇、王文興的現代主義小說，葉慶炳、周志文的散文的專論，夾議夾敘，對文的欣賞，對人的關懷，躍然紙上。

文學為何？文學何為？《柯慶明論文學》提出宏大的命題，也做出全面性的思考，更以實際例證作為貫徹「同情」詩學的方法。筆鋒起落五十年，柯慶明教授一點一滴打造了他的文論，也為臺灣中文學界樹立典範。他的貢獻有待後之來者細細體會。我與柯教授論交逾三十年，無論為學與做人，都深受啟發。謹以此文，表達我所認識的慶明兄：對學術永保熱情，對後輩永遠支持，對生命永懷熱情。

